

當代社會工作學刊
第十一期 頁 1-4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al Work
No.11, pp.1-41
Reprints and permissions:
<https://reurl.cc/kd8EpG>

新媒体时代同性恋大学生身份认同建构过程研究

郑佳然* 文倩茹**

(北京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2488)

*郑佳然(1984-),女,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性别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相关的教学与研究。通讯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拱辰街道书院南街11号院1号楼1单元301,邮编:102401;电话:+86 15201025860。Email:zheng.jr@bit.edu.cn

**文倩茹(1993-),女,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学生。

摘 要

随着互联网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来源更为多元，人际交往与互动方式也随之改变。对于大学生同性恋群体，新媒体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社交方式，也促进他们不断思考自身的性身份并对其进行界定与建构。本文在 Cass 的同性恋认同发展理论基础上结合 7 名 19-23 岁的中国大陆同性恋大学生的情感经历，考察分析了新媒体对同性恋大学生自我身份认同建构过程的影响，并对西方同性恋认同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应用提出批判性反思。本文认为，新媒体的确有助于同性恋大学生在认同困惑初期得到更多同性恋相关信息，从而正视自我的性身份，完成认同比较；而多元化的网络社交方式可以更好地帮助他们完成认同接纳的过程；但是，互联网的出现并不能完全改变同性恋者在异性恋为主导的主流文化中的境遇。甚至，由同性恋亚文化衍生的网络青少年流行文化开始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网络暴力出现；与此同时，新媒体时代的同性恋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网络社交的方式，而对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与互动更为谨慎，这都不利于同性恋大学生认同统合的最终实现。

关键词：新媒体；同性恋大学生；身份认同；建构过程

Study on the Identity Formation Process of University Homosexual Students in the Wak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Media

Zheng Jiaran Wen Qianru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people nowadays can get access to information via multiple ways, which accordingly changes the ways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Especially for the young group among homosexual people, the emergence of the internet has changed not only their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models but also their identity formation. Basing on Cass's theory of homosexual identity formation (HIF),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hanging models of interac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der identity of seven university homosexual students between the age of 19 and 23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ew media. A multiple-case research method along with in-depth interviews is used in this study to collect data. It argues

that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media has facilitated ‘the first conscious awareness’ of university homosexual students through providing wider social platform and multiple interaction channels to establish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wing to the internet, homosexual students can easily go through the stage of Identity Confusion and reach the next two stages – Identity Comparison and Identity Tolerance. However, even though the new homosexual subculture emerged along with the new media can facilitate young people’s Identity Acceptance to some degree,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towards heterosexual marriage plan an obstacle for homosexual youths establishing Identity Pride. Furthermore, the over-usage of new media accompanied with cyber violence could indulge homosexual youths into a virtual world and hinder their relationship establishment in real life, which is not good for the last stage of Identity Synthesis. This indicates the limitation of applying Western theory of homosexual identity development into the Chinese context.

**Key words: new media; university homosexual
students; homosexual identity; identity
formation process**

同性恋（**homosexuality**）是指以同性为对象的性爱倾向和行为（李银河，2002a）。德国精神病学界最早对同性恋行为及其活动开展研究，随后，“同性恋”这一名称逐渐被精神病学界和社会所认同（王礼申，黄玲，2013）。同性恋不仅是一种性取向和行为方式，也是一种性身份，代表着一种规范或者角色（Tasker & Wren, 2002）。同性恋者能否接受自己的性身份，归属于同性恋群体，即建构同性恋身份认同（刘俊，张进辅，2009），对促进和维护同性恋个体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作用（王中杰等，2012）。

随着时代的发展，同性恋群体经历了从被归为“性犯罪”到“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和认可”的艰辛历程（王中杰等，2012）。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ICD-10 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名单上删除，2001年第3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2001：138-139）。然而，在科学界逐渐认识到同性恋是正常现象的今天，我国大部分民众仍因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而对同性恋现象存在误解，“同性恋”一词也被严重污名化，同性恋者真实的生存状况并不为公众所了解。大学生同性恋群体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边缘群体，他们经受着想要结婚而无法结婚的压力，且可能因为性取向而在生活和工作中屡遭挫折。一方面，作为一种亚文化群体，

同性恋大学生所承受的压力可能超乎常人的想象；另一方面，有文献表明，在日益开放的高校生活中，同性恋大学生的比例却正在逐年呈现上升趋势（李永洪，2014）。特别是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如微信、QQ、博客等个人媒体形式成为主流），同性恋大学生有了更多的机会通过虚拟社交软件结交朋友，参与同性恋社区的活动。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1）新媒体对同性恋大学生身份认同及其建构过程有何影响？（2）新媒体的出现对其性别身份认同建构具有的正、反面影响都有哪些？本文以中国大陆同性恋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旨在探索其身份认同建构过程，进而为高校教育工作者正确引导同性恋大学生成长成才提供参考。

壹、文献综述

认同由英文单词“identity”翻译而来，最初是一个哲学概念，表示“变化中的同态或差别中的同一个问题，如同一律”（张海洋，2006：39）。美国心理学家 Erik H. Erikson 最早将其引入社会心理学，作为社会心理分析的一个技术术语来使用，并于 1940 年首先在他的青少年心理分析研究中使用“自我身份”（ego identity）一词，将其定义为一种“群体心理现象”（世瑾，1989）。Erikson 认为，个体建构“自

我身份”的过程就是个体与社会的身份交互形成一个整体的过程。由于人格发展是终其一生的事情，个体在人生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面临自我认同危机的问题，对认同危机解决的成败决定了个体能够建构一个稳定的自我认同（波普诺，1999：151）。随着认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认同”逐渐成为一个综合的概念，“社会关系”或“情境”被引入有关认同的研究，因为情境本身就是由个体对其在社会关系中的参与和成员身份的认知所形塑的（王莹，2008）。Erving Goffman（1986）在其《污名：关于被损害了的认同的管理笔记》一书中分析了情境中的自我，并将之用于对被污名化的群体的研究，分析他们如何呈现或试图隐藏被污名化的自我。他将认同进一步细分为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个人认同（personal identity）和自我认同（ego identity），并利用这种区分将“污名”定义为“特性与刻板印象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

认同理论旨在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对研究同性恋群体有重要指导意义。学者们一直致力于同性恋者自我身份认同建构这一自身内化的过程（王晴锋，2016）。国外学者 Cass（1979）基于人际和谐理论提出了同性恋的认同发展模型，这是在研究同性恋的身份认同时运用得最多的模型。根据同性恋者对自己的感受、认知、行为等方面，Cass 将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分为以

下六个阶段：（1）认同困惑，即当自己发现与他人不同时，性倾向开始个性化；（2）认同比较，即开始质疑，怀疑自己是个同性恋，并开始寻找相关信息；（3）认同容忍，即认为自己应该是同性恋，主动的去对这类群体认识并且进行社交，加强认识；（4）认同接纳，即真正的接纳自己的身份，逐渐的向一部分人表明自己的身份与倾向；（5）认同自豪，即更加偏向于自己的身份，对异性恋抱有怀疑态度，并对自己的身份自豪，积极地参加同性恋的活动；（6）认同统合，更加理性的看待性向问题，在内心和所表现的行为上，以及性向和个体完整彻底的融合在一起。在 Cass 的认同模型中，他认为这是一个单向的过程，每个阶段循序渐进不可跨越，而未能积极完成整个认同过程的同性恋者都被认为是认同障碍，是一种自我认同失败的表现。

此外，对同性恋研究影响较大的还有酷儿理论。酷儿理论形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它使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和性别研究等手段来分析性别认同、权利形式及其常规。“酷儿”是由英文单词“Queer”音译而成，原来是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者的贬义称呼，有“怪异”之意，而后被性的激进派借用以探讨同性恋者及其他性少数群体的行为特征从而推进同性恋平权行动，其中

不无反讽之意（李银河，2002b）。在酷儿理论中，身份被认为是由各种因素和形式构成的，如民族、阶层、性向等，具有多样的性质。而这些构成身份的不同要素又在不断的交互影响，如性向同时还是一个对于阶层与界限的划分。由于某些形成要素从遗传上是不稳定的，如性向，对其进行非彼即此的两分型划分（异性恋或同性恋）可能会影响一些行为方式以及特殊身份的形成从而被主流社会所排斥（巴特勒，2009）。酷儿理论的先驱美国学者 Judith Butler 继而提出“性别操演”的观点，认为人们的同性恋、异性恋或双性恋的行为都不是来自某种固定的身份，而是像演员一样，是一种不断变换的表演。根本不存在“恰当的”或“正确的”社会性别，即适合于某一生理性别或另一生理性别的社会性别，也根本不存在什么生理性别文化属性（巴特勒，2009）。异性恋只是被人为的“天生化”、“自然化”地用以当作人类性行为的基础，异性恋的性统治是生理性别的强迫性的表现（巴特勒，2009）。酷儿理论挑战了异性恋的“自然性”，提出了是性欲摆脱性别身份认同的可能性。

而我国对于同性恋群体的研究是基于西方同性恋研究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中国国情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因此，我国的同性恋研究在其身份话语表述及其

对身份政治问题的讨论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国情以及本土性实践相关（王晴锋，2016）。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同性恋群体主要面临如何建构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刘靖，王伊欢，2011）。由于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不仅仅需要个体自我的认知以及承认，还需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双向作用（李永洪，2014），我国同性恋群体正在经历一个从没有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向开始逐渐自我觉醒转变的过程（王晴锋，2011a）。

由于同性恋者自我认同的发展时期通常始于14至18岁间（李银河，2002a），因此，研究青年同性恋者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现状及其身份认同建构过程，有助于促进同性恋者的认同发展。在对男同性恋大学生性身份认同的研究中，王中杰等（2012）发现，男同性恋大学生对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主要经历三个发展历程，即童年期没有意识的性别以及性的倾向与行为、青春期发现自身性倾向并产生情感困惑和探索、成年期接纳自我并产生身份认同。在这一认同发展过程中，大学生同性恋群体作为高素质青年，能够更加理性、积极地认识同性恋身份，正确面对针对同性恋者不正确的观点和认知，进而和外界搭建联系（胡珍，吴银涛，2013）。而对青年女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研究也表明，当代中国青年女同性恋者人际交往以及情侣关

系的成立对指控男权社会、瓦解父权家庭结构以及构建多元化家庭形式均具有积极作用(刘亭亭,2012)。

然而,也有研究表明,我国大学生同性恋群体自我身份认同往往是紧张的、缺乏安全感的、割裂式的以及缺乏信心的(张冰清,2012)。一方面,大学生同性恋者渴望被外界接受与肯定其身份;另一方面,他们却因畏惧压力而不得不对其性身份保密,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令他们难以忍受。因此,很多同性恋大学生采取的措施是逐渐脱离正常的世界,对它保持少量的情感及社会联系。他们对同性恋群体的日趋依赖也导致了割裂式的身份认同,即将性身份与其他社会身份剥离。同性恋大学生对自己的性别身份认同是一个充满折磨和苦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同性恋”是大学生同性恋者唯一自我认同的身份和自我描述,也是他们生活的主要意义(张冰清,2012)。张丝艳等(2014)根据大学生性心理发展和社会化过程,将同性恋大学生可能出现的问题归为以下四类:自我探索时期可能出现的困惑、身份认同困难可能导致的问题、身份认同后可能伴随的社会压力以及满足自身需要时可能出现的问题。通过对华东某高校的同性恋组织进行研究,王建明(2016)总结了高校同性恋组织具有松散性、网络依托性、跨校性、低调性、内部性和组织纯洁性

等特点。该研究肯定了高校同性恋组织存在的意义，认为校园同性恋组织具有让同性恋者缓解心理压力的功能。

总之，国外学者的研究对本文具有启示作用：如 **Erikson** 将个体建构“自我身份”的过程定义为因个体与社会进行身份交互而形成的整体过程。该理论启发笔者通过研究大学生同性恋者主动或被动地与社会和文化发生交互的过程，从而探索其性别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而 **Butler** 的酷儿理论指出了性向不只是对于身份的描述，还是对于个体的生理、心理、欲望的描述，这也提示笔者在研究过程中要深入挖掘，并努力理解大学生同性恋者经历的复杂甚至自相矛盾的心理历程。此外，国内学者的研究也为进一步探索与分析新媒体时代青年同性恋者在建构身份认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惑和困难具有借鉴意义。然而，西方较为常用的同性恋者身份认同建构模型是否也适用于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同性恋大学生群体呢？此外，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以及社会文化日益多元，当代同性恋者的认同发展模式是否仍符合单向逐一的建构过程呢？基于此，本文将以 **Cass** 的认同发展理论为基础，通过研究新媒体影响下当代中国同性恋大学生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进一步探索西方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理论模

型的本土化过程。

贰、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开展案例研究的方法回答上述问题。案例研究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探究(empirical inquiry)，常被用来研究现实生活背景中的即时现象(contemporary phenomenon)，研究者通常大量运用事例证据(evidence)来展开研究(Yin, 1984)。案例研究试图“理解特定情况或特定条件下(单一事件中的)行为的过程”(Stake, 1995)，其意义在于回答“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Stake, 2000)。案例研究是一种定性的研究范式，其抽样规则是理论抽样，即所选择的案例要体现研究问题的独特性，最适合回答该研究问题，这是出于构建理论的需要，而并非仅根据数据的易获取性和代表性等表层因素而进行的统计抽样(Eisenhardt, 1991)。案例研究的初衷和方案设计都是以理论为基础的，而这些理论基础反过来又为数据分析提供了指导(Yin, 1984)。

本案例研究在网络公开招募和筛选研究对象，主要通过微信和微博平台进行招募信息的推广。由于男性在同性交友网站中表现得更为活跃，且在招募访谈

对象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积极，因此在最终选取的 7 名同性恋大学生中有 6 名均为男性大学生，有且仅有一名女性大学生全程参与了研究。从 2016 年 3 月起，研究者便开始于这 7 名同性恋大学生建立联系，随后的一年中研究者分别与他们进行了一到二次的面对面深度访谈，访谈时长为一至两个小时，访谈地点选择学校走廊、咖啡厅等受访者感觉舒适的地方进行。访谈主要围绕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家庭情况、新媒体使用情况、发现自己性向的过程、情感经历、出柜情况几个维度进行，具体包括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性向、当时是如何接受自己的性向等问题。研究者还根据受访对象的实际情况提出针对性的问题，旨在了解同性恋大学生是如何认识并接受自己的性别身份以及新媒体时代其人际关系与社交互动情况。经研究对象同意，访谈过程全程录音，并于访谈后由研究者进行转录誊写以及整理。本文对研究对象进行匿名编号处理（见表 1）。为保证研究者对访谈对象所表述的意义符合访谈对象原意，研究者进行访谈分析后交由访谈对象核对。

表 1 受访者基本情况表

受访者编号	性别	年龄	学历	主要社交方式	新媒体对身份认同的主要影响
M1	男	22	大四在读	微博、微信等	收集同性恋信息、正视自我性取向
M2	男	18	大一在读	微博、微信、QQ等	网络交友、分享网络流行文化
M3	男	23	大四在读	知乎、豆瓣、贴吧等	分享网络流行文化
M4	男	19	大一在读	微博、微信等	收集同性恋信息、正视自我性取向
F1	女	23	本科	Instagram、微信等	扩大社交圈
M5	男	20	大二在读	知乎、微信、QQ等	分享网络流行文化
M6	男	23	大四在读	Grindr、Blued、微信、QQ等	扩大社交圈、宣传线下活动

叁、研究结果

一个人的身份在其与社会的互动中不断改变和形成（白相辉，2008）。随着新媒体的兴起，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以及人际互动的方式都发生了一定改变，在新的社会互动过程中，个体对自己身份的认识和认同也不断发展、形成。

在本研究中，以互联网代表的新媒体社交在 7 名同性恋大学生认识自我、接纳自我的过程中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互联网的出现使他们在刚对自己的性身份产生怀疑时能够更快地收集到更多相关信息，从而开始正视自己的性倾向并不断进行探索；同时，网络社交的互动方式对同性恋大学生在确定自己的同性性倾向后是否能够接纳自己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互联网使得同性恋大学生能够更方便地结识和自己性倾向一致的同龄人，并将虚拟世界中形成的关系发展至现实生活。而这种互动关系的延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新兴网络青少年亚文化的衍生与发展，如“搞基”、“基友”、“淋文化”等具有同性恋含义的流行语因已成为一种被更为广泛的青少年群体所接受的网络流行语而与最初的同性恋含义日益变得不相干了，这无疑对同性恋大学生接纳自己的性取向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网络社区在推动同性恋亚文化传播的同时也对同性恋身份认同的价值限于一定的范围。正是由于网络社区带来的是一种独特的传播情境以及在这种特定

情境下产生的交往关系，这种新型交往关系往往存在欺骗性和不安定性的隐患。作为一种媒介，互联网的确能够促进一些同性恋大学生提早认识自己，清楚自己的性取向，并更加理性地思考出柜的问题，进而使其更快地完成从认同困感到认同接纳的过程，但网络上的一切交流与活动最终都要回归到现实生活。在异性恋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虚拟的网络空间对同性恋者的认同自豪及其统并不能到彻底改变或决定的作用。

一、从认同困感到认同比较——网络有助于同性恋大学生正视自我

本研究发现受访者基本都是在小学时期甚至更早便发现了自己对于同性的好感。那时他们虽然对自己产生怀疑或者困惑，但是普遍忽视了这个问题。直到初中或者高中开始进入青春期的萌动阶段，这些同性恋大学生喜欢上了班里或者年级里的同性同学，并开始有了性的意识，他们才逐渐认识并重视自己与众不同的性偏好。

“其实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对同性有好感了，但是一直不愿意承认。”(M3)

“确实怀疑过（我自己）...小学的时候和邻居小孩互玩过生殖器，但是只是为了好玩，并不是有性欲望...初中的时候就有了性冲动。最开始是和—个男生关系比较密切，经常会谈心事，后来发展到手牵手的程度...”(M4)

在经历过对自我性别身份的困惑后，一些受访者开始通过新媒体查询同性恋的相关信息。贴吧、微博、豆瓣、知乎是同性恋大学生查询信息时使用较多的几个网络平台。其中，贴吧结合了搜索引擎，是人们最容易接触到的社交平台。因为它有将有共同兴趣的人聚集的功能，所以同性恋群体也有相关的贴吧，如 Gay 吧、同志吧、Les 吧、肩上的脚丫吧等。但由于贴吧并不是一个专业性的同志社区，它的受众较广、用户年龄较小，里面的内容也是参差不齐；微博因其涵盖内容广泛、社交功能强大成为中国现在最流行的社交平台。微博中与同性恋相关的内容非常多，也是一个对同性恋群体相对宽容的公众社交平台。在微博上，有很多发布同性恋资讯的博主以及揭露同志圈现状的博主；豆瓣是以电影、书、音乐等艺术作品为主，兼具社交功能的平台；而知乎是涉及不同领域的问答平台。在这些平台上会分出不同的专业领域，因此会聚集很多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人。同性恋大学生能够在同性恋专区中找到与自己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其他同性恋者。

“因为喜欢 TFBOYS，所以关注他们的微博。也是通过这个媒介，认识了粉丝中的 Gay，平时会和他们互动...一般喜欢 TFBOYS 的男生基本都是 Gay，就算是直男也不会恐同，所以跟他们交往会比较轻松，不用担心很多事情。”（M1）

“知乎其实是一个学术交流网站，但是也有社交的功能，因为它的逼格（高），所以找到朋友和对象的质量比较高；而豆瓣上面有兴趣小组，而且有同城的板块，可以发布一些东西，还可以根据别人发布的看他是不是靠谱。如果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就会进行联系。算是比较靠谱的平台，所以我很多朋友都是在豆瓣上认识的。”（M3）

多元的网络平台为同性恋大学生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而腐文化 1i作品的流行及其在网络中的传播，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青年同性恋者的生活，让他们真正开始关注并正视自己的性倾向。

“最开始是通过百度来了解同性恋的，搜索了同性恋、艾滋病、基佬、Gay、拉拉、女同、形婚等，但是结果都不满意。后来在贴吧同志吧、Gay 吧、反同吧、同妻吧等地方了解了比较多。”（M3）

“当时已经确定自己是 Gay 了，也在网上查了一些相关的知识和一些色情的资源。当时是通过一个彩虹旗的网站找到的，以及百度看了下为什么会是同性恋，以及感染病之类的...”
(M4)

“初中的时候开始比较流行一些比较腐的动漫，而且那时候和一个女生谈恋爱，发现自己并不享受，也不感兴趣，就基本确定了自己是同性恋。”(M5)

二、从认同容忍到认同接纳——虚拟社交平台有助于同性恋大学生建立人际关系

在网络不发达的时代，同性恋者们主要通过传统交往方式，如在公厕、浴室、同性恋酒吧、公园等场所进行面对面接触，来寻找伴侣或者一次性性行为(张翼，董小玉，2013)。而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同志 BBS 留言板、同志聊天室、BF99 华人同志交友网站陆续兴起，继而又出现了 Blued、ZANK 等可以用来搜索附近同性恋者的社交软件。这些以信息互联网为依托的虚拟网络交往形式逐渐成为青年同性恋者社会交往的主流方式。据受访者介绍，同性恋网络社交工具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源分享型的普通社交平台，里面有一些科普知识、情感分享等，兼顾同性恋社交功能，如上面提到的微

博、贴吧、豆瓣、知乎等；另一类则是专门为同性恋群体服务的专业社交型软件，具有帮助陌生人寻找和自己性向一样的人并结交朋友的功能。目前国内比较流行的男同性恋者社交软件主要有 Jack'd、Blued、ZANK 等，还有一些专门针对女同性恋者的社交软件，如 the L (Rela 热拉)、LESDO (乐 Do)、LesPark (LPark, 拉拉公园) 等。相比局限在酒吧、公园以及浴室等公共场域的直接沟通与交流而言，新型交往方式具有传统交往方式无法比拟的优势。本研究中的 7 位受访者均表示，互联网不仅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他们主要的社交场所。受访者均有过通过同性恋社交软件来结交朋友的经历。

“我有用过 Blued 或者 Jack'd 之类的软件，但是对 Blued 比较不信任，因为很多都是约炮的，里面认证的一般都不会理人，但是没有认证的很多人用假的照片，也不敢想和这些人聊。” (M2)

“飞赞是一个同志专业社区，算是一个稍微干净一点的平台，主要都是大学生或者刚毕业的年轻人，上面有很多有内涵的东西...一些文章和日志都比较有深度...比如要不要分 1 和 0、同志之路应该怎么走、同志在全国的地区分布等等，感觉 (在此) 能受到比较大的启发。” (M3)

“有用过 Blued，上面有很多人聊天，但是自己从来不在上面聊天，只是遇到还不错的人会加微信，用微信聊。用了这些软件后了解到圈里并不是自己认为的那么好，但也没那么坏。通过 Blued 还认识了我们学校同性恋小组的人。”(M4)

在虚拟的网络社交圈中，同性恋大学生几乎毫不忌讳他们的性倾向，因为在网络社交平台中比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同性恋者的容忍度比较高。几位受访者都谈到，网络社交使他们能够自由选择和自己性取向一样的人加入自己的社交圈。这些虚拟社交圈的存在促进了同性恋大学生的人际交往，也促进他们更好地接纳自己。

“网络上认识的朋友都知道自己的性向，（自己）不会隐瞒。这种社交方式挺好的，大家都是彼此相同才成为朋友的，所以（在网络中）接纳自己、接纳别人也都更容易一些。”(M1)

“现实的朋友（知道自己是同性恋的）的非常非常的少。不过在网上认识的朋友圈子里的都知道自己是 Gay。”(M3)

当然，对很多同性恋大学生而言，虽然网络社交平台的确为自己提供了很多便利，但真正接纳自己的性别身份认同也是一个战胜自我的过程。

“高二时和一个关系暧昧的男生的事情让自己的生活很受影响，那时还挺纠结的。无法再逃避了，所以开始直面（这个）问题。但还好，正视之后（觉得）轻松了很多，在真正确定了之后也就接受了自己的身份。”（M3）

“我觉得新媒体能帮助大家互相认识、扩大社交圈，挺好的。但是有时候比较不好意思主动加别人好友，就是（不知道）如何促进半生不熟的人之间的人际交往吧。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如何克服自己心理上的问题，比如我查到附近有个同志 PARTY，但是我不敢去。”（M6）

但是，也有受访者表示，他们在接纳自我时并没有感到任何困难，尤其是当他们通过网络了解了更多同性恋的相关知识之后。

“因为已经知道了很多（关于同性恋的知识），在接受自己的性向的过程还是比较自然的，并没有纠结。”（M4）

作为受访者中唯一的女性，F1 表达了她对网络社交特殊的感情，因为正是因为互联网的缘故才使 F1 和她的女朋友相识并且走到一起。在 F1 看来，同性恋的身份认同让她很容易并乐于接纳。

“当时是在 Instagram 上因为一个共同喜欢的摄影师和同一个漫画，那个女生疯狂给我点赞，于是就慢慢地互相认识了，觉得她是自己喜欢的样子，所以就在一起了。虽然是异地，但是现在（我们）在一起已经三年了...觉得和她在一起很开心、很骄傲，因为这个女生很优秀，觉得女生比男生好很多。”（F1）

三、喜忧参半的认同自豪——新兴网络亚文化发展下的自我认同

认识自己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对于同性恋大学生而言，知道自己的性取向，是自我认同中的一个单元。但在自我认知形成与发展过程之中，当同性恋大学生发现自己的性倾向与主流文化相悖时，在接纳自我的同时建立认同自豪，真正完成由负向状态朝向支持性状态的发展历程却并非易事。更多的同性恋大学生用“喜忧参半”来表示他们的心情。

“（同性恋）其实也很正常啊，没有觉得有多特别，更谈不上说有多自豪。毕竟社会主流还是更支持异性恋，所以既不会（为自己的性向）感到不幸也不会多为自己自豪或者排斥异性恋。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吧...不过，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抱着消遣同性恋的态度，动不动就是‘好基友’啊、

**‘淋语’啊，说白了就是为了博眼球，（我）不是太喜欢...”
(F1)**

通过访谈发现，新媒体除了帮助同性恋大学生扩展同性恋社交圈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促进了一些新的网络青少年亚文化的衍生与发展，而“淋文化”就是互联网催生的青少年亚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淋文化”起源日本歌手以及欧美歌手的贴吧，起初是对另一个明星的排挤与嘲讽。因为其粉丝群体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同性恋者，尤其是男同性恋者，所以“淋文化”也被运用于同性恋群体中。后来随着信息的不断沉淀、网友的再创造和传播甚至网名的自发认同等因素，“淋文化”嬗变为互联网时代粉丝文化的一部分，并越来越多地与恶搞现象联系在一起，甚至衍生出网络暴力。而随着“淋文化”的发展及其本身的趣味性，它也被喜欢追星的青少年群体快速地运用到日常生活交流中，从而成为了一个异军突起的网络亚文化。即使现在很多年轻人并不真正了解它的来源，也并不妨碍他们之间使用“淋语”进行交流。

“主要和一些说淋语的 Gay 玩。淋语和淋文化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纽带，因为喜欢淋语的男生一大部分都是 Gay。在朋友圈中平时也就是聊聊日常，聊聊男人。”(M2)

“淋文化主要是搞笑，在 Gay 圈里也算是小众，但是可以

通过这个来辨明身份，像是基佬的暗号...但是随着淋文化的发展，很多直男直女也知道了并开始运用。但是如果有自己不感兴趣的人问起来自己就可以说是好玩。”（M3）

正如上述两位受访者所言，“淋文化”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排除反同者的功能，虽然只是一部分同性恋者痴迷于“淋文化”，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通过使用“淋语”发现和与自己性向一致的人。当然，“淋文化”也经常被一些善于揭露同性恋群体不良现状的博主所运用。因此，在同性恋者接触到“淋文化”的同时，还会接触到同性恋圈子中一些现状。

四、认同统合的困境——在现实生活中选择性出柜

“出柜”（coming out）是同性恋圈中的隐语，即走出自我藏身的“橱柜”（王晴锋，2011b）。对同性恋者而言，在现实生活中选择出柜意味着他们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性向问题，并可以在内心和所表现的行为上达成一致，是其自完成我身份认同的较高阶段，即 Cass 同性恋认同发展理论中的认同统合阶段。而在中国大陆地区，中国主流文化已将异性恋、异性婚姻以及结婚生子这一文化逻辑强势植入人们的脑中。中国传统老话所讲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也说明了婚姻的重要功能就是确立双系抚育，共同抚育儿女已成为婚姻的意义所

在。因此，文化偏见、社会污名和大众猎奇等诸多原因使得同性恋大学生不愿也不敢轻易出柜，而“认同而不出柜”（王晴锋，2011b）的生存状态也使同性恋大学生的认同统合面临着尴尬的困境。

在本研究中，大多数受访者对于出柜这件事还是比较谨慎的，即使他们能够顺其自然地接受自己的性向，但是对于向身边的朋友或者家人出柜，他们还有更多的思考和顾虑。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出柜，这些同性恋大学生对出柜对象也都有自己的考察标准，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接受度较高的人或者关系非常密切并且不会泄露他们性向的人作为自己出柜的对象。

“我曾经喜欢的男生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可能会有知觉，因为我觉得自己表露得还挺明显的，会照顾他、维护他。但是除非有个自己非常喜欢的人能够让自己义无反顾，否则自己并不打算主动出柜。”（M1）

“我周围的朋友都知道我是 Gay，而且也并不怕被别人知道自己是 Gay。以前高中的时候在学校里就有很多同学甚至低年级的人知道自己的性向，因此还变得小有名气。但是因为在家中这一辈的唯一的男丁，所以还没有和家里人出柜，也不愿意想这个事情。”（M4）

从访谈中可以看出，尽管 M4 能够比较容易地向学校的同学表明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甚至对于为此获得的知名度还颇为自豪，但是 M4 也坦言，自己并不敢想如何向家人出柜。其他受访者也表达了和 M4 相同的观点，他们不愿和家人出柜的原因包括怕家人不认同自己、经济尚未独立、还没有遇到值得自己不顾一切的人、害怕来自舆论的压力等。目前，7 名受访者都没还有向其家人出柜，他们表示，向家人出柜可能是现在生活中遇到的最困难的事情之一。

“试探过家里的态度，平时看到新闻有相关内容的时候会问家人的想法，有时也用朋友举例...现在家里已经开始警惕，所以经常会催自己找女友。因为家里反映激烈，所以没有打算向家里出柜。”（M3）

其实，对于同性恋者来讲，在经历了对自己性向的质疑、搜索相关信息、正视性别身份之后，还会经历自我接纳并建立自己的社交圈的过程，新媒体在其青年群体身份认同建构的整个过程中都起了尤为重要的作用。更多的青年同性恋者更愿意在网络社交平台上暴露自己的性取向。新媒体时代，很多青年同性恋者对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变得更加谨慎，他们对于同性恋者在现实社会中可能受到的对待更多时候持观望态度，对身边的人也是有选择地出柜。

“我觉得现在网上可能（同性恋）相关的信息还是比较少，而且也比较负面，所以很多人对同性恋群体依然存在比较大的偏见。就是国家虽然对同性恋的态度是不支持不反对，但是最后落实到媒体层面的时候，基本就只能看到负面信息，比如什么仙人跳或者杀人之类的。这也不利于同性恋者出柜。”
(M1)

肆、分析与讨论

一、对性身份的反思与建构

从某种程度上讲，同性恋身份注重于个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更强调个体自我认同的过程性。不同于社会地位（status）意义上的社会身份认同（social identity），同性恋身份认同是个体建立在性认同基础之上逐渐形成的（Tasker & Wren, 2002），综合了个人的自我形象认识以及他人或社会对个人的看法（Cass, 1979）。这种过程性贯穿了人的出生到人的死亡，即 Erikson 对人格形成的八个阶段的论述。可见，身份认同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本质、信仰及一生趋向的一种相对一致和比较完满的意识的建立过程，需要后天不断的强化与塑造。对于同性恋者而言，由于社会环境仍是异性恋观念主

导的，社会化的过程会使同性恋者对自己充满否定和贬抑，因此，他们除了要应对异性恋主导的社会环境对同性恋者的恐惧和歧视，还必须应对已经内化到自我认知中的恐同主义（余文斌，2013）。从本研究资料归纳整理的结果来看，新媒体的出现和广泛应用通过深刻改变了受访同性恋大学生的互动方式，进而促使他们反思和重新定义自己的性身份。7名受访者的身份认同过程都经历了从少儿期无意识的“非典型”性别偏好和行为，到青春期的同性情感困惑和探索，再到成人期的同性身份接受和认定的发展历程。在这一过程中，新媒体不仅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渠道来了解同性恋这个群体和相关的资讯，虚拟的网络平台也使其更愿意在此分享自己的故事、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对青年同性恋者而言，这种新的社会交往在其成长的每一个时期形成同性恋倾向、达到性身份的自我认同都起了重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由于社会主流价值观对同性恋者的偏见而给他们带来的压力。

根据 Cass 的同性恋身份认同的模型，当这些同性恋大学生发现自己与其他人不一样时，就会产生困惑的情绪。而贴吧、百度百科、微博等网络平台的普及有助于他们及时收集信息，承认自己的性向，从而完成从认同困惑到认同比较的阶段；随着同性恋大学生通过网络接触到更多这个群体的其他成员时，他们逐渐开始感到自己并不孤单，这有助于他们尽快走出对自身性身份的痛苦与纠结，更好地接受自己。Cass

将这一过程定义为认同容忍到认同接纳的过程。但是，作为同性恋认同发展模型的较高阶段，Cass 所定义的“认同自豪”在中国大陆同性恋大学生身上体现出更多的曲折性。比如，在本研究中，虽然由同性恋文化衍生的新兴网络青少年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青年同性恋群体能够较为理性地看待性向这一问题，但很多同性恋大学生对如何接纳自己的性身份以及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进一步公开自己的性身份却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是在主流文化的压迫下，同性恋大学生对社会认同结果进行权衡的结果。对于许多同性恋者来讲，他们公开身份可以得到来自精神上的利益，如自我公开带来的放松与坦然、从与他人分享和同性伴侣相处所带来的乐趣与满足等，但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公开身份所要付出的成本也是巨大的，包括金钱的付出、朋友的疏远、家人的受伤害、自身名誉的下降、升职机会的丧失、社会的不认同乃至边缘化等（刘靖，王伊欢，2011）。而这个权衡与内化的过程，即 Cass 理论中“认同的统合阶段”在中国大陆同性恋大学生身上更显得尤为尴尬。

总之，互联网的出现对于同性恋大学生完成身份认同建构的整个过程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在新媒体广泛应用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已经认识到性身份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社会建构出来的。尤其是高学历青年同性恋者，他们不再主动地接受主流社会为其贴上的标签，而是愈发能够客观

地将性身份与道德污辱分离开来（白相辉，2008）。但研究结果也表明，在“重家庭、重婚姻”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同性恋大学生仍更倾向于选择向家庭隐藏自己的性身份（王晴锋，2014），他们需要较长时间完成其认同统合阶段。

二、对话语权的反思

新媒体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有助于激发人们对个体亚文化的关注，对话语权进行反思，使得同性恋群体在新媒体时代下呈现“去污化”的发展趋势（张格，2016）。从某种程度上讲，新媒体能够通过引发社会对同性恋者的关注，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现实问题，从而对同性恋群体起到了赋权的作用。正如酷儿理论所提倡的，同性性取向是一种对文化中非常态的表达方式，同性恋亚文化的支持者们反对非此即彼、非是即非的思维方式。因此，当新媒体为同性恋者寻找同伴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虚拟社交平台，使其有望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与支持，进而促进其完成对自我的认同时，其影响是积极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虚拟社交方式的双面性，在提供便利同时，新媒体的自发性、隐匿性也可能为网络暴力和同性恋亚文化的不良发展创造便利，从而带来消极影响。

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性别以及性倾向是被权力话语所构造的，性的研究即对话语内在特殊性的研究（李

银河，2009）。同性恋身份的出现是基于性的新型话语系统的制度化，应对这一特定话语内部的概念、类型和身份进行分析（王晴锋，2016）。身份认同理论认为，身份是个体在与社会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建构身份认同的历程可划分为不同的进程，每个进程均有要进行的事情以及完成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些任务才能完成对于身份的认同（张静，2006：4-5）。这种理论虽然也能够直观地反映同性恋的认知过程，但是对于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上来说，该理论忽视了个体在认同过程中可能产生学习的行为以及认知变化的过程，也忽视了多个要素和每个历程的交互产生的影响，忽视了个体的复杂性与差异性。

如前所述，同性恋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是繁杂的，其身份的确立，不仅是由同性恋者的自我认定来决定，更重要的是由社会认定和他人认定来决定的（刘靖，王伊欢，2011）。而社会和他人对同性恋者的态度很大程度取决于主流文化的话语权力。在我国，同性恋仍然不被当前的主流文化所接受。当同性恋者感知到这样的主流文化态度时，对于他们的身份认同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极有可能压抑自己的性向和对自己的认同。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通过新媒体出现之后，就会逐渐打破这种主流文化对于同性恋的桎梏，使人们不再简单通过生理性别来判断一个人的性别与性向。而同性恋者在接触到不同的观点之后，也会对于自己的性向与身份进行

更加深入的探索，思考如何才能更好的在主流文化下生存，而不是受限制于主流的文化。

相对于过去，现在社会对于同性恋的认知以及接受度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2019年5月24日，台湾同性婚姻合法，也使其台湾成为亚洲地区首个认可同性婚姻的地区。在新媒体上，关于同性恋的话题也不再避讳不谈，越来越多的人会谈及同性恋的现象。尤其在青年群体中，很多人对于同性恋问题保持中立的态度，还有一部分的人站在支持的一方。社会环境的相对宽松，加上同性恋资讯的传播、腐文化的发展，一些同性恋者也开始在现实生活中接受自己的性向。可见，新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促进了同性恋者建构和谐的人际关系，也促进了同性恋亚文化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新媒体对于青年同性恋者产生的影响也具有两面性。目前新媒体社交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可能对同性恋者造成伤害。如国内一些媒体仍然将同性恋者视为一个边缘群体，对他们的报道和描述缺乏客观性和准确性（刘懿璇，2016）。网络中还存在很多针对同性恋群体不友好甚至激进的态度和言论，这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青年同性恋者建构正确的身份认同。

伍、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在新媒体迅速发展的今天，同性恋者的生活方式也受到

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青年同性恋群体，一方面，新媒体为其提供了更为开放、多元的社交平台，使搜集资料和寻找资源变得更为便利。这不仅有助于促进青年同性恋者搭建自己的社交圈，也有助于他们更快地完成自我身份认同建构过程。比如，近年来互联网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专门针对同性恋的社交平台，以 Blued、ZANK、咸蛋家等代表。这些社交平台使青年同性恋者能够快速找到更多同性恋者，从而建立朋友圈子甚至发展成为情侣。随着青年同性恋者在新媒体上日益活跃，也逐渐衍生了越来越多新的青年同性恋亚文化，例如“淋文化”、“耽美文化”等。这些亚文化具有排除恐同心理的作用，能够促进青年同性恋者肯定对自我的身份认同，积极面对自身的性取向。可以说，新媒体的出现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青年同性恋者“自我怀疑”和“找对象难”的问题。

但另一方面，新媒体对青年同性恋者的成长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比如，新媒体蕴含信息量大，且对信息缺乏选择性，当青年同性恋者通过网络接触到过多对同性恋群体的负面看法和报道时，会加强其逆反心理和对社会的抵抗情绪，在其选择出柜的时候也会因为顾虑舆论压力而变得更为困难；此外，新媒体还存在着安全性低、真实性低等问题。过度依赖新媒体、长期沉迷于虚拟的网络世界会降低青年同性恋者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交积极性，阻碍其与他人建立现实关系。这些都不利于青年同性恋者真正地认同和接纳自

我。

总之，作为同性恋者中的高知群体，大学生同性恋问题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社会对于当代大学生都给予了一定的期待与话语权利，所以大学生在营造一个包容的话语环境的努力中本来就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性恋大学生群体更要把握和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勇于表达自己让他人接受，为自己争取一个较好的舆论氛围和文化氛围。无论是我们回避对其同性恋身份的认可，还是同性恋大学生回避和他人建立正确的人际关系，都是不可取的。而作为高校的教育工作者，更应从大学生个体成长的角度出发，对同性恋大学生不干涉不歧视，一视同仁，正确引导同性恋大学生成长成才。

备注：

1. 腐文化：指的是“耽美文化”，起源于日本并发展成为描写男性之间的爱情的作品，随后衍生成为一种同性恋文化（王晴锋，2011a）。

参考文献

- 白相辉（2008）。《新媒体对同性恋互动方式与身份认同的影响——以高学历青年同性恋为例》。吉林: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胡珍、吴银涛（2013）。<新世纪中国大学生同性恋状况的变化——基于他人认知和本人态度行为的比较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3期，页65-69。
- 刘俊、张进辅（2009）。<同性恋认同发展的理论模型述评>。《心理科学进展》，第2期，页403-413。
- 刘靖、王伊欢（2011）。<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研究综述>。《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8卷，第1期，页131-139。
- 刘亭亭（2012）。<青年女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研究>。《中国性科学》，第12期，页80-87。
- 刘懿璇（2016）。<对同性恋群体的研究分析——以新媒体为出发点>。《长江丛刊》，第3期，页36-37。
- 李银河（2002a）。《同性恋亚文化》。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2002b）。<酷儿理论面面观>。《国外社会科学》，第2期，页23-29。
- （2009）。《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内蒙古：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李永洪（2014）。<浅析大学生同性恋现象及其应对策略>。

-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第30卷，第5期，页120-125。
- [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1999）。《社会学（第十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美]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2009）。《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颠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余文斌（2013）。〈网络社区中的同性恋身份认同〉。《安徽大学学报》，第37卷，第1期，页144-148。
- 世瑾（1989）。《宗教心理学》。北京：知识出版社。
- 王建明（2016）。〈高校同性恋者群体内部组织初探——以华东某高校为例〉。《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页36-38。
- 王礼申、黄玲（2013）。〈女同性恋自我身份认同的质性研究〉。《湖北函授大学学报》，第26卷，第5期，页109-110。
- 王晴锋（2011a）。〈生存现状、话语演变和异质的声音——90年代以来的同性恋研究〉。《青年研究》，第5期，页83-96。
- （2011b）。〈认同而不“出轨”——同性恋者生存现状的调查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页142-153。
- （2014）。〈“家庭出柜”：影响因素及其文化阐释〉。《广东社会科学》，第3期，页189-197。
- （2016）。〈同性恋研究中的身份政治、亚文化及话语之争〉。《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3 卷，第 2 期，页 74-82。

王莹（2008）。〈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研究评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5 卷，第 1 期，页 50-53。

王中杰、冯成亮、耿耀国（2012）。〈男同性恋大学生性身份认同的定性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第 26 卷，第 8 期，页 620-625。

张冰清（2012）。〈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身份认同——以某大学生同性恋群体为例的实证研究〉。《科协论坛》，第 1 期，页 61-64。

张格（2016）。〈新媒体时代下同性恋群体形象去污化初探〉。《新闻研究导刊》，第 6 卷，第 5 期，页 36-37。

张海洋（2006）。《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北京：民族出版。

张静（2006）。《身份认同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丝艳、徐震雷、李红、王维民（2014）。〈对同性恋大学生进行非问题导向性个性化辅导的方法探究〉。《中国性科学》，第 23 卷，第 2 期，页 94-97。

张翼、董小玉（2013）。〈论新媒体环境对青年亚文化的影响——以耽美文化为例〉。《新闻界》，第 20 期，页 42-45。

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2001）。《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济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Cass, V.C. (1979). Homosexual Identity Formation: A Theoretical Model.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4(3): 219-235.
- Eisenhardt, K.M. (1991). Better Stories and Better Constructs: The Case for Rigor and Comparative Logic.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6: 620-627.
- Goffman, E. (1986).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Stake, R.E. (1995). *The Art of Case Study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take, R.E. (2000). Case Studies. In N.K Denzin & Y.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435-454.
- Tasker, F. and Wren, B. (2002). Sexual identity and gender identity: Understanding difference.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7 (3): 315-319.
- Yin, R.K. (1984).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Newbury Park, CA: Sage.
-